



# 大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26 December 200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六委员会

#### 第 20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0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巴亚提先生 ..... (伊拉克)

### 目录

议程项目 75：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工作报告(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请在有关记录的印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印发之日  
后一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DC2-750, 2 United Nations Plaza)。

更正将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在届会结束后印发。

08-57722 (C)



下午 3 时 10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75：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续) (A/63/10)

1. **Winkler 先生** (丹麦) 代表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 发言。他针对“国际组织的责任”的专题指出，北欧国家广泛赞同条款草案第 46 条至第 60 条，这些条款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款草案第 48 条正确地处理了针对国际组织所提求偿要求的可受理性的问题；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则能够也应当适用于该项求偿要求，但条件是，在国际组织的当地救济为可利用和有效时，才应认为是用尽了。用尽的方式显然不同于国家一级通行的方式，正如委员会所述，其中将包括各种内部法庭和能够处理有关问题的机构。就条款草案关于反措施的第 54 条至第 60 条而言，北欧国家同意起草委员会的做法：在联合国与某一会员国之间出现争端时，联合国的规则作为“特别法”应优先于一般国际法。

2.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专题，没有必要把国籍和公民权事项 (尤其是剥夺公民国籍) 列入讨论，因为此种事项往往分散人们对核心问题 (即国家驱逐外国人的权利) 的注意。在这方面，北欧国家希望结合所有有关规则、编制一套一般原则，而不是起草声称似乎要编纂习惯法的条款、以填补现有条约法中可能存在的差距。令人遗憾的是，条款草案工作过程往往会涉猎不同法律领域，其中一些具备了进行国际编纂的条件，而其他的则涉及劳工移民等领域，那方面并无明显的需要。

3. 国家驱逐外国人的权利是国家主权所固有的，但行使此项权利时必须遵照国际法，同时适当顾及国际法律秩序当前所面临的挑战。这一权利也要求国家履行相应的、再度接纳本国国民的义务，这是目前有关驱逐外国人的主要问题之一，这方面现有大量的国际法。因此，北欧国家敦促委员会集中审视外国人被驱逐情况下适用的原则，而不要试图起草附加条款。

4. **Hernández 先生** (墨西哥) 针对“对条约的保留”的专题指出，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三次报告 (A/CN. 4/600)

全面探讨了所涉的复杂法律问题。报告突出显示了制定解释性声明和反对意见与提出保留和反对保留之间的程序相似之处，同时考虑到其各自宗旨和法律效果间的显著差异。关于导则草案 2.9.3 (重新定性解释性声明)，墨西哥代表团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此“重新定性”的法律效果是改变提交声明的国家或组织与“重新定性”的国家或组织间的关系中、单方面声明的法律地位。同样，特别报告员正确地指出，适用于针对解释性声明的重新定性和反对的程序规则和时限，属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0 条第 5 款范畴。在此期间后，重新定性作为保留，因此作为反对意见，不能发挥其所有的法律效果；解释性声明虽被重新定性为保留，但仍必须被视为已获接受。但是，考虑到特别报告员在导则草案 2.9.8 和 2.9.9 中关于不可能假定接受解释性声明和在这方面保持沉默的意义的建议，导则草案中关于重新定性和接受被列为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的现有措辞给此文书的其他缔约国带来了特别沉重的负担。作出单方面声明的国家原本仅列为解释性声明的内容，上述其他缔约国却要加以“重新定性”；为重新定性或反对意见的目的，它们这样做的能力会因须遵守对保留的意见所适用的时间范围而受限制。委员会一些成员所谓的“变相保留”因而可能会不为其他缔约国所注视。特别报告员指出，对保留的迟交的反对意见没有真正的反对意见的所有影响，它们不应被视为反对意见本身，而应视作解释性声明。

5. 因此，墨西哥代表团同委员会一些成员一样，认为从业人员和保存人员在对“变相保留”作出反应的形式、时间和法律效力方面，需要得到指导。鉴于提出反对意见的 12 个月时限，就“变相保留”案件规定时间范围时应考虑到：有关的保留并非作为保留、而是作为解释性声明提交的。导则草案 2.6.13 的第二部分可以为解决这一特殊情况提供依据，因为该部分规定，如果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同意受条约约束是在接到保留通知的 12 个月 after，时限则自通报愿受此约束之日起生效。12 个月的时限如此延长，亦可变通适用于“变相保留”的个案：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反

对意见的期间将从作为保留提出的保留对条约缔约国生效之时起算，这样就有 24 个月的时间来提出反对。这一额外的时间从而即可防止出现如下可能的情况，即：“变相保留”作为解释性声明不为人注意，却享有与作为保留提出的保留相同的时限。此外，它还会具有法律确定性，从而确保保留的有效性或生效不停留在不明状态。

6. 在谈到导则草案 2.6.8 时，他说，由于插入了“之前”这个词，所提意图不能对通过提出反对所据的相同文书来表达，因为它只能在按照《维也纳公约》第 24 条、条约在有关当事方间生效前提出。因此，他欢迎留出时间，让条约当事方能开展协商，以通过对具体规则提出保留，避免因一项声明而使条约所有规则不能生效。

7.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专题，清楚制定适用法律规则清单可以确保尊重人权。因为如特别报告员所述，每个国家都有授予或撤销国籍的专属权限，委员会的分析只能帮助确定某人是否有外国人身份，这样可以确定对某人之驱逐是否为国际法所禁止。《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第 31 条第 2 款规定，无国籍人只能是在执行按照适当法律程序达成的决定的情况下加以驱逐。因此，特别报告员正确地认为不必专门制定一条反映这一规则的条款草案。墨西哥代表团还同意委员会一些成员的意见，即：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者情况特殊，需要加以详细分析。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在下次报告中，将开始从人权方面着手研究对驱逐的限制。

8. **Li jnzaad 女士** (荷兰) 提到“对条约的保留”专题时说，荷兰代表团不相信“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概念有任何益处。在这种有条件的声明的后果同保留基本类似时，即应视之为、并称其为保留。她不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即：反对重新定性的解释性声明的时限与反对保留的时限相同。在处理解释性声明时，使用保留和反对的类比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特别是在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均为同一国所作时。澄清单方面声明背后的意图，责任在声明的声明方；其他缔约

国完全有理由期望声明国将适当地标明声明的性质。只有在声明被称为保留时，声明方才可以确信其他国家正确理解声明的范围。特别报告员的逻辑似乎有利于标错其声明性质的国家，而不利于其他国家。

9. 沉默的含义既是哲学问题，又是国际法方面的复杂问题。至于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的后果，尤其是在一国既作保留又发表解释性声明的情况下，沉默就是沉默。从中得不出什么结论，也推断不出什么默许。有其他想法，则会又一次对保留和反对作出不当类比，无视声明国选择不把单方面声明适当标为保留的做法。荷兰代表团在稍后阶段将就这些问题提供更详细的评论。

10. 荷兰是约 30 个国际组织的东道国，对“国际组织的责任”的专题特别感兴趣。有人频频指责委员会在制定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时、过于依赖国家责任条款，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可以适用于其他国际法人；委员会已对之加以调整，并在必要时增列新的条款，以确保其案文适合国际组织的情况。

11. 有人对是否需要专门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提出质疑，因为如特别报告员报告所述、这方面实践有限，还因为现有的数百个国际组织中，只有少数对此专题作了评论，其中有些非常简短。然而，荷兰代表团认为，此种条款是必要的。国际组织的数量大大增加，它们的活动对国际关系和个人日常生活都有影响。大家普遍认为，而且有充分理由认为：国际组织有能力实施国际不法行为。因此，必须设立制度来处理这种行为，即使这方面实践不多：最好能让各个法院应用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一般规则，而不让每个法院对与国家责任的类比作出各自的解释。

12. 有人建议，委员会与国际组织的法律顾问之间应举行会议，以确保委员会熟悉现有实践；她支持这一建议。荷兰代表团将提出更广泛的书面意见，包括对反措施的一些意见。

13.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专题，荷兰代表团同意以下的观点，即：国际法不容许一国将其拥有其他一国

或数国国籍的国民视为外国人，尤其是《欧洲国籍公约》第 17 条规定，缔约国拥有他国国籍的国民在该缔约国本国内居住，享有与该缔约国其他国民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此外，禁止驱逐国民的规定也适用于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者。

14. 主要或有效国籍的概念，通常只在多重国籍引发国籍冲突(如外交保护范畴内)的情况下才提出。由于这种情况与驱逐外国人问题截然不同，荷兰代表团赞同委员会的看法，即：主要或有效国籍的标准不能成为一国将其拥有其他一国或数国国籍的国民作为外国人加以驱逐的理由。

15. 关于丧失国籍、开除国籍和驱逐的问题，根据国际法，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在其国内法中就丧失国籍作出规定。荷兰法律就有这样的规定：例如，荷兰国民如果自愿接受他国国籍，则可能失去本国国籍。然而，她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允许开除国籍，而且绝不能导致无国籍状态。

16. 最后，虽然有必要澄清第 4 条草案同样适用于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国民，但她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没有必要就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A/CN.4/594)所涉问题专门制定条款草案。

17. **Tavares 先生**(葡萄牙)针对“对条约的保留”的专题指出，“保留”和“解释性声明”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应该区别对待，除非它们彼此有关。鉴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没有涉及解释性声明，葡萄牙代表团主张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

18. 关于导则草案 2.9.1，“批准”一词具有很强的法律内涵，不适合解释性声明。应使用“同意”一词，如在导则草案 2.9.9 中。关于导则草案 2.9.2(反对解释性声明)，葡萄牙代表团同意这种看法，即：在试图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加以明确区分时，“排除或限制其效力”一语可能产生歧义。此外，提出另一种解释实际上可能构成一个新的解释性声明，其结果是拒绝、而不是单单反对。

19. 关于导则草案 2.9.3(重新定性解释性声明)，葡

萄牙代表团认为，各国和国际组织不应有权重新定性另一国或国际组织的解释性声明。此外，由于“变相保留”是保留而不是解释性声明，委员会应进一步考虑把此项规定放在《实践指南》中适当的地方。

20. 葡萄牙代表团对导则草案 2.8.4 感到有些担心。在解决涉及条约或有关规定的解释的争端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应能就条约或其某些条款制定解释性声明。审慎的做法是提及诚意的原则。此外，他想知道为什么导则草案标题中采用“抗议”一词，而正文中却用“反对”。

21. 导则草案 2.9.8(不可推定赞同或反对)和 2.9.9(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涉及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问题。与保留意见的情况相反，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或反对不可推定。此外，沉默不能被视为作出声明的手段，除非显然可能作出另外的推断——这是一项法律原则。关于解释性声明，对沉默作为作出反应的手段并没有一般规则，人们对明确的反应也没有一般的正当期待。就此类声明而言，沉默应有一个含义只有当它的价值可以清楚地推断出一项条约的规定。在此方面，导则草案 2.9.9 第二段应加以完善，以澄清“某些特定情况下”一语的含义。

22. 关于导则草案 2.9.10(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反应)，葡萄牙代表团也认为，这种声明不同于单纯的解释性声明。但是它们也不能被视为保留，因为它们使得参与有关条约受某种具体解释之限制，而保留的目的是要排除或修改条约的法律效力。应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明确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性质，确定与之有关的法律效力和程序，并决定处理这些问题的适当方式。

23. 《实践指南》对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处理对条约的保留这一复杂问题时，将极为有益。他鼓励该委员会尽快完成编制工作。

24. 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专题，他重申，葡萄牙代表团关注的是，这些条款草案跟国家责任条款跟得太紧。需要采取更有重点的办法，来处理国际组织



的责任所带来的具体问题。此外，委员会的分析应反映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差异，并反映：各国际组织的权限和权力，以及各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方面，迥然不同。

25. 反措施的专题就国家而言是有争议的，就国际组织而言问题更多。在哪些条件下国际组织可能成为反措施的目标？可能诉诸反措施？葡萄牙代表团对此感到关切。此外，使用欧洲联盟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例证并不一定适当，这说明缺乏相关的实践以及难以制定适当的、一般和抽象的法律解决方案。还应注意区分反措施和其他类似措施，同时考虑到此措施的来源、法律依据、性质和宗旨。一个国际组织根据其内部规则、对其某成员采取措施，如安全理事会实施制裁，这不能被视为反措施。鉴于有关反措施问题的复杂性，此事宜审慎为之。

26. 特别报告员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四次报告(A/CN.4/594)讨论到两个问题(即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者和开除国籍)需要慎重处理。《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应将国籍视为个人固有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力。在这方面，禁止国家驱逐本国国民属于绝对规则，不应有任何例外；包括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者的情形。对这些人的禁令不能仅限于可能会造成无国籍状况的情形；这些人的身份也不应成为一个国家规避禁令的理由。此外，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者不能被其国籍国视为外国人。葡萄牙代表团也不认为主要或有效国籍的概念同驱逐外国人有关。

27. 各国不应能够以开除国籍为手段来规避不得驱逐国民的禁令，即使对拥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者也是如此。此外，葡萄牙代表团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只要不导致无国籍状态、不歧视、也不武断，只要尊重某些程序上的保障，就可以允许开除国籍。

28. **Horváth 先生**(匈牙利)说，在“对条约的保留”的专题方面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值得的。条约绝对是国际公法最大的来源，国际秩序取决于各国按照条约

确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在这方面，《实践指南》草案为各国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严格实施准则也会减少各国提出无效保留的情况，这一事态发展对于人权条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至于解释性声明的具体问题，匈牙利代表团认为，导则草案 2.9.1 至 2.9.8 作出了有用的澄清。

29. 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专题，匈牙利代表团支持特别报告员的如下建议：委员会在进一步运作之先，应根据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提意见，审查已暂时通过的文本。案文将因此变得更加连贯；例如，列入国际组织援引国家责任方面的规定是否可取的问题就可以重新加以讨论。在这方面，他指出，鉴于欧洲联盟的特殊性质，援引欧盟实践方面的例证时应小心谨慎，而且在援引之前要慎重考虑能否从某一具体案件中归纳出一般规则或原则。

30.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专题，他说，持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者在其任何国籍国均不得被视为外国人。有关丧失国籍以及能否容许开除国籍的问题属于国籍法的讨论范畴，历来在国家管辖范围内。《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间接地肯定了不驱逐国民的原则。有如此多的国际协定规定禁止驱逐，应视之为一项基本人权。委员会有些成员曾表示禁止驱逐国民(包括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者)是习惯法的一部分；他同意这一观点。报告第 192 段有类似内容。匈牙利《宪法》明文禁止任意剥夺匈牙利公民进入匈牙利的权利，禁止驱逐公民(无论他们拥有双重或多重国籍与否)。

31.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专题，匈牙利代表团希望，按照其他有关国际文书，如第 30 届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会议通过的《国内便利和管理国际救灾和初期恢复援助工作导则》，拟议文书应采取无约束力准则的形式。重点应放在受害者有权得到人道主义援助。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应成为受灾国不让受害者得到援助的借口。至于本专题的范

围，匈牙利代表团认为应限于自然灾害，排除人为灾害和武装冲突，因为有关武装冲突的制度已经存在，而且干预国人员面临很大风险。

32. 匈牙利代表团完全赞同特别报告员在“国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上遵循的准则。重要的是，若干国家法院最近在涉及国家官员豁免权的案件中得出了不同结论。显然，这方面国际法需要更加精确。因此，最好能摘要汇编有关条约、习惯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法院的裁定。

33. 关于各国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匈牙利代表团认为打击全球犯罪活动的努力必须自身具有全球性。各国间为此开展合作，是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这种合作不仅限于传统领域，如奴隶贸易、海盗活动和种族隔离，而且扩大到恐怖主义、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等活动。各国无疑有义务引渡或起诉，不管这方面有没有国际条约。对现有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以及国家立法和国家惯例作出综合分析，将有助于确定此义务的确切性质。

34. **Mitchell 女士**（加拿大）针对“驱逐外国人”的专题指出，如特别报告员所述，要由每个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确定丧失国籍的条件，此种规则不同于驱逐外国人的规则。因此，加拿大代表团欢迎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的如下建议：关于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所涉问题的条款草案是没有必要的。委员会对此专题的其他方面亦应采取同样细致、谨慎的做法。

35. **Alias 女士**（马来西亚）称，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条款草案是仿照国家责任条款的。之后她又说，援引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权利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所载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组织。

36. 关于对国际组织的反措施，马来西亚代表团认为国家责任条款中对反措施的限制也应适用于国际组织。然而，委员会应适当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的差异。

37. **Le Duc Hanh 女士**（越南）说，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工作是及时和重要的，因为在现代世界，

国际组织众多。由于国际组织在性质、结构、成员组成和规模方面迥然各异，条款草案应具一般性，以尽可能广泛地涵盖诸多组织。

38. 越南代表团鼓励委员会继续审议国际组织使用反措施的问题。需要注意，不过，鉴于实践有限、存在着滥用反措施的危险，有可能破坏国际组织的运作，甚至危及该组织的存在。越南代表团支持设立工作组以审议此问题的提议。委员会还应当充分考虑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意见。此外，反措施问题不能与按照《联合国宪章》实施的制裁相等同，两者范围和目标完全不同。

39. **Belliard 女士**（法国）说，国家责任条款无疑是“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的有益模式。在第 48 条草案（“求偿要求的可受理性”）中，尤其是第 2 款，重申一下以下的观点并无害处：必须用尽一组织提供的任何现有和有效的补救措施，才能追究该组织的责任。在这方面而言，要对“当地补救办法”下定义，因为个人可以在并非全国性的管辖机构对一个国家采取司法行动。

40. 反措施并不是所谓“次要”的国际组织责任规则。将其归入履行国际义务项下更为恰当；它们应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规则密切相关。至于可能被用来对付国际组织的反措施，有关实践极其有限，因此，委员会应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事实上，委员会内的讨论内容已从国际组织的一般责任转到有关这类组织可以对国家采用反措施、甚至在组织内部采取反措施的特定问题。正如法国代表团过去所述，委员会可以在关于国家责任条款以及国际组织责任的单一研究中，涵盖反措施的专题。反措施只可以在国家及其所参与的国际组织同此类组织的职能和细则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背景下，加以审议。一国际组织对成员国采取反措施，以及一成员国对组织采取反措施，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过，在两种情况下，存在着对组织具体适用的规则意味着在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或对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方面受到限制。

41. 换言之，国际组织在履行职能时、对其成员国所采取的措施不应被视为“反措施”，委员会的辩论中有时却将其视为“反措施”。此外，她对应不应该允许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对该组织采取反措施有相当的保留，尤其是因为没有任何重大实践。如起草委员会对第 55[52 之二]条草案（A/CN.4/L.725/Add.1）所做的那样，要对这种可能性和对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的一般问题（第 54[52]条草案中涉及）加以明确区分。然而，草案第 55[52 之二]条糊里糊涂。至少，行文应澄清“根据该组织规则……的合理

手段”一语的含义，那将不允许对一个组织采取反措施。该条款草案还暗示，反措施应被视为不得已的措施；但一切反措施都是这样。此外，由于一个组织的规则，不管怎样广泛地加以理解，必然属于特别法，她质疑该条款草案有何益处？在编纂方面，它只会不当地认可基本上属于假设的一种情况。最后，她对第 54[52]条草案的措辞持怀疑态度，其现有说法含糊不清。她相信，评注将澄清该条的涵义。

下午 4 时 30 分散会。